

## 国际合作——术语学发展必由之路

郑述谱

(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 哈尔滨 150080)

中国是一个具有古老文明的国家,与其他文明古国相比,中华文明从未中断,她是世界上古老文明持续发展至今的独一无二国家。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高度发达。在中国古代先哲的思想宝库里,比如在孔子与荀子的著作中,一些与术语相关的思想光辉也曾经闪现。中国人的术语活动,也具有相当久远的历史。更早的不说,最迟从19世纪末“西学东渐”开始,就有了专门的相关组织,致力于汉语术语译名的统一。新中国成立以来,术语工作更是成绩斐然。不过,说到术语学的理论研究,长期以来,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却大大滞后。理论研究的薄弱与理论指导的乏力,自然会使得术语实际工作的成绩大打折扣。到了上世纪80年代,这种不利情况开始引起了一些学者的高度关注。从那以后,致力于改变这种状况的学者日渐增多。他们往往是从介绍国外术语学的发展状况开始的。

我个人由词典编纂与词典学研究转向术语学研究,大约是在10年前。这事看似多少有些偶然。我无意阅读到了一本俄文的术语学理论著述,知道了在一个个具体学科术语之上,还有一门专门研究各学科术语普遍性问题的独立学科——术语学,于是,便萌生了从事术语学研究的打算。此前,我在词典编纂实践中,曾经接触过不少不同学科的专业词汇与术语,但对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术语学的性质与研究状况,却几乎一无所知。10年后,在对术语学有了较多了解的今天,特别是对术语学与词典学的关系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之后,我才发现,当初我的转向并非偶然,甚至可以说,这偶然寓于必然之中。

10年间,围绕术语学理论研究,我和我后来结识的同道,都做了哪些事呢?

首先,我们先后完成了两项研究课题。这两项课题分别是:“俄国术语学理论与实践研究”与“国外术语学理论研究”。前一课题的研究成果集中体现为《俄罗斯当代术语学》(商务印书馆,2005)一书,后一课题成果的形式为有待出版的3部译著,1部专著,而围绕这两个课题发表的论文40余篇。其次,这期间我个人结合课题前后指导了4名以术语学为研究方向的研究生。再次,由我所在的黑龙江大学与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先后共同主办了3次“中国术语学建设研讨会”。最后,我还设计了另一个国际间的术语合作项目,通过名词委、科技部,已经纳入2009—2010中俄两国政府间的合作项目。

如果不是像上面这样用数字,而是用略加概括的语言来总结我们10年来围绕术语学研究所做的工作,那么,可以说,我们做了以下这几件事。第一,我们清醒地、有计划地向国内学界引介了国外术语学理论,与此同时,也扩展并加深了我们自己对术语学的认识。从俄

国一个国家的术语学理论与实践切入，到进一步扩及到整个国外术语学理论研究，从借助俄语一种外语为工具，到借助德、英、俄三种外语为工具，从一般的情况介绍到提出带有自己理论思考的观点，从以一种语言里的术语作为研究对象到以术语学具有普遍理论意义的问题作为研究课题，这中间经历了一个扩展、深化过程。与10年前相比，我们的认识丰富、充实多了。第二，我们自觉地为我国术语学学科的创建做了一些前期铺垫工作。这里我想特别提醒注意“自觉”与“前期铺垫”。所谓“自觉”，是指我们对所做的事情的意义从一开始就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同时我们的目标又始终如一。我们毕竟是在经过一番酝酿思考之后，以理论研究为切入点跨入术语学大门的。从开始研究国外术语学理论起，我们就认定这是一门很有用的学科，是一座值得开采的“富矿”。我们心中的目标就是创建中国术语学。我们召开的几次术语学研讨会之所以都冠以“中国术语学建设”的字样，其原因也正在于此。说是“前期铺垫”，是因为我们深知，中国术语学建设之任重而道远，我们目前所做的，还只是大工程开始之前整地备料等前期准备工作，或者说，是主题乐章开始前的前奏曲。真正的主体工程似乎尚未开始。第三，我们还在术语学的人才培养上取得了一些成绩。这对术语学建设来说，是最根本、最基础性的工作。中国术语学的未来肩负在他们身上。

不过，总的来说，就我个人的感觉而言，面对横跨多种学科的、带有综合性的术语学，我们还是刚刚入门。对许多事关术语学建设的大问题，我们还有待进行深入的思考。

先从一个具体问题说起。“中国术语学建设研讨会”里的“中国术语学建设”应该怎样译？凭我水平有限的英语，我想到可能有两种译法：一是译作 *building chines terminology*，一是 *building terminology in China*。这两种译法所传达的意义应该是不一样的，前者似乎突出了“术语学”的“中国特色”，而后者更多地是表示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创立此前这里没有的术语学。如果英语的表述确有这样的差异，我们该选择哪种译法呢？看上去这仅仅是在两种不同译法中作出一个选择，其实，这背后牵涉到一个更重大的问题，就是对我们所致力建设的中国术语学究竟该如何理解。中国术语学仅是用术语学的普遍理论来解决汉语术语为主的种种问题，还是一定要有由中国人提出的、同样带有理论意义的某些主张？这里似乎也存在一个“全球化与本土化”问题。如今，在世界经济发展愈来愈呈现一体化趋势的大背景下，许多学科、部门直至行业都面临这个问题。术语学在中国如果能一直走下去，会不会总有一天也提出这个问题？即使在今天，如果要对我国术语学建设作出某种战略性的规划，这个问题可能也无法回避。

术语学似乎天生带有国际性。这一点可以从两方面加以证明。从术语学的学科属性来说，人们都承认它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这个综合性体现在它与认识论、逻辑学、认知科学等多种学科都有关联，而上述的这些学科都带有全人类性，或称超民族性。这就在相当大程度上决定了术语学研究的国际性。从术语学工作的实践来看，术语学的国际性就更明显。我们不妨提及这样一个事实。任何语言的术语语料库或者颁布的术语标准，除去本民族语的术语定名之外，总少不了至少一种或几种其他外语的等价词。至于说到不同语言之间术语或其定义之间常常需要的所谓“协调”，那更能证明术语学工作的国际性。

遗憾的是，在此之前，国际术语学界难得听到中国学者的声音。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我国的术语学理论研究还很薄弱。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对中国学者来说，当下最要紧的，是应该勇敢地走出去，以一种开放的姿态，多多与国外的同行接触，向他们学习，有条件的，还可以共同开展一些合作研究。

这本论文集也许是国外出版的第一本收集中国学者术语学论文的集子。它由俄国学者与中国学者共同努力编辑完成，这不是偶然的。更多的不说，这至少体现了俄国术语学研究者

视野的广阔。暂时，中国学者也许还说不出什么振聋发聩的理论观点，但从长远来说，中国学者加入国际术语学研究行列，不仅会大大促进中国术语学研究的发展，也许还会扩大国际学者的思路。这是因为中国毕竟是具有古老文明传统的国家，汉语毕竟是印欧语之外的语言。以欧洲文化与语言为依托的术语学来到中国这样一个国家，无论是它的成绩，还是它遇到的“麻烦”，都会对术语学的全面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也会提出一些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就这一点来说，中国需要国际术语学界，国际术语学界也需要中国。这一点，我们的俄国同行也许早就看到了。为此，我们向俄国的同行以及支持他们的基金会组织致以深深的敬意与谢忱。同时，我们也意识到，我们应该责无旁贷地支持与配合他们的活动，但愿这些活动会推动中国学者进一步走向世界。

收稿日期：2010-11-08

【责任编辑：张春新】